

导 读

《尉繚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它比较集中、系统地论述和记录了我国先秦时期的军事理论、军队制度和具体的法规条令，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认识，对建军和作战问题的思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结晶和法规制度。因此，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我们研究和了解先秦时期以及后来的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制度史，并对其有所继承、发扬光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下分几方面对这部著作做一概略的解读，以便于读者在阅读原文前对此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千古公案，众说纷纭

《尉繚子》的性质及作者

古往今来，研究《尉繚子》的学者和著作很多，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在该书的性质、成书、作者等方面仍存在着不少疑点和争论，成为千年不了的学术公案。

《尉繚子》一书的著录，在现存的史料中，最早见于东汉著名历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中。《汉志》诸子略中的杂家类著录：“《尉繚》二十九篇。”班固在此条下加注：“六国时”。即明确其作者为战国时代的人。而《汉志》兵书略兵形势类又有：“《尉繚》三十一篇”，未标注时代。一部《汉书》同时著录了两部《尉繚》，一为杂家著作，共二十九篇；一为兵形势家著作，共三十一篇，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尉繚子》却是二十四篇，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很多需要辨清的问题。

首先，今传本《尉繚子》究竟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呢，还是原书已失传，后代人假借其名而杜撰的另一本书呢？这种托名作伪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后人托名作伪大抵有两种情况，一是历史或

传说人物本无著述，但因其名头甚响，影响颇大，后人便将自己的著作归到前人名下，不求出名，只求著作能流行于世，如《黄帝内经》本为后代的一部医学著作，却一度署名为黄帝所著；二是历史或传说人物可能有著述，但在流传过程中失传了，后人就自己做一部，署上前人的名字，其用意也是借助名人效应，抬高自己的作品，如《六韬》旧题吕望(姜太公)撰，《三略》(又名《黄石公三略》、《黄石公记》)旧题黄石公撰。(当然上述几部历史著作只是作者伪，内容却不伪，其历史价值都是非常高的)南宋以来，已有不少人因传世本《尉繚子》在卷数上与史料记载的出入和在文字上所谓“文气不古”，从而怀疑它并非先秦原书，而系后人假托的伪书。到了清代，疑古之风盛行，几乎所有前代古籍都被辨伪家们用极其犀利而又挑剔的眼光翻了一个遍，《尉繚子》因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疑点，被学术界的多数人判定是伪书。但历史经常喜欢跟人开玩笑，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座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大批先秦时期的竹简文献，其中就有《尉繚子》的残篇，而且许多篇目和内容与今传本大体相符，证明这些篇目和内容至迟在汉初就已流传于世，其撰著与成书年代当然要更早，将其确定为先秦古籍已无疑问，这就使伪书一说不攻自破了。

其次，今传本《尉繚子》与《汉志》中著录的两部《尉

繆》究竟有何关系,它是诸子杂家类中的《尉繚》,还是兵形势家类中的《尉繚》?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历史上从来就只有一本《尉繚》,因为其内容较为驳杂,所以班固《汉志》将其既归入诸子杂家,同时又归入了兵形势家。这种观点的根据是,《汉志》诸子略杂家类中并不排斥收录原属兵家的著作,班固对杂家类的说明即云:“右杂家二十四家,四百二篇。入兵法。”杂家类中也确实收录了谈兵法的书,如“《子晚子》三十五篇”;班固自注说:“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而《尉繚子》中除大量军事内容外,还有许多反映儒、法、道等家思想的内容,所以早在汉初刘向、刘歆父子奉朝廷之命校阅群书时,就将一本《尉繚》归入两家,班固《汉志》沿袭其说,因而使后人误将一部书当成了两部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最初只有一部《尉繚》,由于在流传过程中的增删和演变,于是出现了卷数不同、内容也有差异的两种版本,古人在著录时就将其当作两部书了。

二是认为兵家《尉繚》与杂家《尉繚》是书名相同而内容不同的两部书,今本《尉繚子》是《汉志》中的兵形势家《尉繚》,而杂家《尉繚》已经失传。尤其从宋初以后,这种观点十分盛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尉繚子》被收入影响很大的官定兵学丛书

《武经七书》之中，作为武学必读的兵书经典之一颁行于世。从此，《尉繚子》之归入兵家，几成定论。在古代各种官府和私人编制的书目中，《尉繚子》也只见于兵家，而不再见于杂家了。

三是同样认为历史上曾有两部《尉繚》行世，但今本《尉繚子》是杂家《尉繚》的传本，兵家《尉繚》自南北朝时即已亡佚。其理由主要是从《隋书·经籍志》到《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了杂家《尉繚》而不见兵家《尉繚》的踪迹。说明从南北朝到宋代，流传下来并藏于官府的只有《汉志》中的杂家类《尉繚》。同时，从内容上看，班固《汉志》对兵形势家的概括是：“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其对杂家的概括是：“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今本《尉繚子》显然与班固对兵形势家的定义不甚相符，而其兼收并蓄的特点与杂家却颇为吻合。此外，目前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类书中辑出的古本《尉繚子》佚文有这样几条：1、“天子玄冠玄纓，诸侯素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纓。”2、“天子文衣文缘。”3、“天子宅千亩，诸侯百亩，大夫以下里舍九亩。”所涉及的都是服饰、宅第的等级制度方面的内容，应是上古礼制的遗存，不像兵家文字，若归入杂家著作，倒是比较合适。所

以，这些内容应是从古本杂家类《尉繚》二十九篇中佚出的。

四是同意班固《汉志》中的杂家《尉繚》与兵家《尉繚》为两部书的观点，但认为今本《尉繚子》是由这两部书的残本合编而成。持此论者认为，到宋初编定《武经七书》时，原来分别流行于世的杂家《尉繚》和兵家《尉繚》都已大部散佚，因而人们对于两部书的内容、类属及真伪产生含糊认识，于是把两部书当做一部书来看，将其残本合编为一部古兵书，收入《武经七书》之中，成为今本《尉繚子》的定形。

以上各种观点各执一说，既都有其立论的理由，同时也都存在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问题，相对而言，似乎第三种意见更接近于事实一些，笔者倾向于今本《尉繚子》是古本杂家类《尉繚》的流传这一观点，它应是一部以军事内容为主，兼取其他各家思想的杂家著作。

关于《尉繚子》的作者和成书，概括起来也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该书作者尉繚是梁惠王时期的人，故成书时间应在战国中期。其根据是《尉繚子》开篇即有“梁惠王问尉繚子曰……尉繚子对曰……”这样的文字，这是最有力的证据。此外，书中论述的针对性、引证的历史人物的时间下限、涉及到的国别以及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时代特征，都是对上述观点的有力支持。另一种看法

则认为，作者尉繚是秦始皇时代的人，所以成书时间应在战国晚期。其论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大梁人尉繚来，说秦王曰……’等记载。另外，今本《尉繚子》中关于部伍编制的内容与秦陵兵马俑的军阵吻合，书中谈到的军法条令等也与秦国重视法制的传统精神相符。笔者认为，前一种观点的理由更加充分，其论据都出自于原书的内容，因此还是采用前一种意见比较恰当，尉繚当为魏惠王同时代人，杂家著作《尉繚子》的成书年代应当在战国中期。

关于作者的身世和生平，史料的记载很少，我们只能依据这些只鳞片爪的记载作一个大致的勾勒。据明代人汪心所编纂的《尉氏县志》，尉繚的祖籍在尉氏，其地在今河南省的中部，战国时期属于魏国。另据唐人颜师古注《汉书》所引刘向《别录》中的话说‘繚为商君学’商君，就是先秦时期著名的变法家商鞅，这说明尉繚曾经钻研过商鞅的法家思想。尉繚见梁惠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361 年至 320 年之间，因为魏国于公元前 361 年从西部的安邑迁徙到东部的大梁（今河南开封），由此魏国才又被称为梁国，魏惠王才有了梁惠王的别称。公元前 320 年，梁惠王去世，尉繚当然是在这以前见到的梁惠王。在《史记·魏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梁惠王）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

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其意是说，在梁惠王三十五年（公元前 335 年），惠王与齐宣王（《史记》有误，应是齐威王）在平阿以南的地方会晤。由于此前魏国多次战败，梁惠王于是以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赏赐来招揽各国的贤士，邹衍、淳于髡、孟轲都应招来到魏国国都大梁。我们有理由推测，尉繚大约也是在此前后被招聘到大梁，向梁惠王献上富国强兵之策的。至于尉繚的主张是否被梁惠王所采纳、尉繚是否在魏国做了官，以及他在这以后的情况，因史料阙如，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尉繚子》的内容来看，其作者尉繚是个知识渊博、兼通数家之说的人，他有很深的兵学造诣，尤其对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法规条令非常熟悉。同时，他曾“为商君学”，受法家思想影响很大，在《尉繚子》一书中他反复强调要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并对商鞅的“农战”思想十分推崇。另外，他对儒家施政主张也有精到的研究，在书中的《原官》、《治本》等篇中对儒家的政治思想进行了阐发。尉繚的这一特点与战国时期的另一著名人物吴起十分相似。吴起早年师从孔子的高徒曾参的儿子曾申学习儒术，后来弃文学武，对历代兵家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一代军事家，同时他对最早在魏国实施变法的李悝等人的法家之术也十分仰慕和喜好，后来他在楚国进行

的变法革新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因而他又是战国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其主要思想的《吴子》一书，即是融兵、法、儒诸家之说于一炉，这与《尉繚子》的兼收并蓄可谓异曲同工。



七雄并立，逐鹿中原

《尉繚子》的时代背景

《尉繚子》成书于先秦的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在经济方面，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铁器和牛耕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水利建设也有长足的进步，从而促进了农田的开发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同时，手工业的发展，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在官府手工业之外，出现了私营的个体手工业。农业与手工业的兴盛，更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在政治方面，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强劲作用下，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为壮大自身的力量，主动改变旧的剥削方式，一方面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积累财富，另一方面获取广泛的社会支持，以积蓄力量，为其从奴隶主手中夺取政权，登上历史舞台奠定经济和政治基础。

从春秋末到战国初，中原诸侯国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夺权斗争中逐步取得胜利，如公元前481年，齐国发生“田氏代齐”，地主阶级代表田成子成为齐国新君主。公元前468年，鲁国的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集

团驱逐国君，在鲁国掌权；公元前 403 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各自建立起新的封建诸侯国。夺权成功的封建地主阶级为巩固既得利益，并在群雄并起的国际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又纷纷实行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变法活动。在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和残酷剧烈的兼并战争中，崛起了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强国，从而形成了“七雄并立”的战略格局，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到封建社会。

在军事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以其特有的进取精神和贪婪欲望，将其经济、政治改革的成果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把春秋以来的“争霸”战争一变而为战国的“兼并”战争。“争霸”战争与“兼并”战争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目的是对霸主名分的争夺，后者的目的则是对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的实际控制和拥有，以此来增加税收、保障兵源，进而兼并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由此求得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土地和人口直接关系到各诸侯国的生死存亡，因而战争目的的极端化也将战争的手段推向极端。正因为如此，战国战争较之春秋战争在规模和激烈程度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参战的人数上，动辄十万甚至数十万，军队的主要成分也发生变化，农民作为新的社会主体成为封建军队的主要来源；在战场的范围上，多次出现数个诸侯大国倾力卷入一场战争的奇观；在战争方

式上，由于战场范围的扩大、军队兵种的增加，已不限于春秋时代以开阔平原作战和单一兵种较量为主的样式，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日益频繁；在战争的残酷程度上，由于铁兵器和弓弩等远程杀伤兵器的大量使用，使战场上的血腥气味更加浓重，伤亡率大大提高，“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火攻、水淹等残酷手段屡见不鲜，以至到战国后期还出现了大量坑杀降卒那样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其目的既是为了尽力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同时也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对敌国心理产生巨大的震慑力；在军队的建设上，各国不但着手扩大军队规模，而且更加重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其手段一是选募精兵，二是强化训练，三是信赏明罚，以法治军，健全军队的法制和条令。所有这些变化必然对军事理论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诸如：对战争的重新认识，战争与国家经济、政治的关系，新条件下的作战指挥，封建军队的建设管理等；而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战争实践以及新兴地主阶级对战争手段和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视，又为军事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尉繚子》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尉繚所见到的梁惠王，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其所处的战国中期，正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魏国是战国最早强盛起来的诸侯国。战国初期，魏惠王的祖父魏

文侯率先实施变法,又重用李悝、吴起、乐羊、公孙豹等一批贤能之士,并很好地处理了与赵国、韩国等周边邻国的关系,使魏国迅速崛起,在对外的兼并战争中屡屡获胜,开疆拓地,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但到了魏惠王执政时期,由于各诸侯国纷纷实行了封建改革,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使魏国陷入强邻环伺的不利处境之中,相对实力明显下降。加之魏惠王在战略指导、外交策略等方面的失误,使魏国在与新兴的齐国的争霸战争中,先受创于桂陵(即公元前 353 年的齐魏桂陵之战),再惨败于马陵(即公元前 341 年的齐魏马陵之战),十万大军覆没,名将庞涓自刎,魏国太子被俘。迫使魏国不得不于公元前 334 年在与齐国的徐州会盟中,将中原霸主的地位拱手让与齐国。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为了力挽颓势,扭转败局,重现魏国昔日的辉煌,除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建立“武卒”增强军事实力以外,还实施广揽人才的策略,即前面提到的所谓“卑辞厚币以招贤者”,于是当时各家各派的著名人物如孟柯、邹衍、公孙衍、惠施、张仪、淳于髡等齐聚魏国,可谓群贤毕至。魏惠王向尉繚子问兵,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推断,尉繚是听说了梁惠王有招贤之举,从他的老家尉氏赶到大梁,向梁惠王进上凝聚其多年心血的《尉繚子》一书,有如春秋末年孙武由齐赴吴,将他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即

《孙子兵法》）献给吴王阖闾。而其《天官》篇中尉繚与梁惠王的问答，应是其门徒后学对二人谈话的记录或追记，是后来补入的。



杂取众家，独具特色

《尉繚子》主要军事思想评说

《尉繚子》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对军事思想和制度的论述和记载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对先秦其他各家的思想和主张也多有阐发，并将其与对军事和战争问题的思考和探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其独具的特色。以下结合史料和战例，着重对本书有关军事的思想内容作一评说。

（一）朴素的军事唯物论思想

《尉繚子》批判了兵学领域中的迷信成份，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为其军事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尉繚子》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集中反映在其首篇《天官》中，同时也贯穿于全书的各篇之中，成为其立论著说理论基础。

在《天官》篇中，尉繚对当时兵学领域中的兵阴阳学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说盛行，反映在军事上，便产生了“兵阴阳家”这一兵学流派，他们主张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等因素，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在当

时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是古代的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水平较为低下的历史局限性所造成的。每战之前，求神问鬼、以占卜来预测战事的吉凶，是上古的人们在战争这头难以驯服的怪兽面前充满困惑和恐惧，不得不求助于自然物的表现，也是古人万物有灵、天人相通观念的集中体现。不仅对战争如此，对所有难以预知的大事，古人都要采取占卜的方式来解惑释疑。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后氏，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蚩夷氏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时尚，是最最重要、最最庄严，也被认为是最最灵验的预测手段。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大量占卜战争胜负的内容。在周代的《易经》中，也有通过蓍草来预测战争结果的卦辞。在我们今天看来，用毫无知觉的动物枯骨和草木植物求得神灵的护佑和预示，似乎是一件颇为可笑的事。但在当时，上自君主，下至将士，却往往对此顶礼膜拜，深信不疑。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不断